

# 7个人的背叛

## 散文：向各个角度敞开

## 代序

南帆

我意外地认识了一批作家。这一批作家名不见经传，默默地分散在大江南北。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各自在某一部电脑的键盘上生产一种简朴而又神秘的文体——散文。现在，他们汇聚到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书——《七个人的背叛》里面，编成了一个团队。

散文算什么？诗人昂起倔强的头颅，激烈地为诗的名誉辩护；小说的声望不言而喻，一个奇妙的故事可能惊动整个社会。只有散文呆在后排，不动声色，如同隐在书生与小姐背后的丫环。许多人对于散文持有一种褻慢的态度。哪一个作家写不了散文呢？

这是一种迷惑。轻蔑散文遭到的报复是，平庸的风格大量盘踞了报刊的版面。偶尔会有些精妙之作一晃而过，如同江面上泼刺一声闪现的鱼脊。这时常引诱我开始在众多的报刊之中搜索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风平浪静，一切如常，信号不再出现。

这一批作家之所以可能集合起来，周晓枫女士的引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晓枫女士自称“老朽”；她的描述之中，一批散文的新锐正在踊跃而至。我将信将疑，周晓枫女士挥笔开列了一份名单：方希，刘春，吕军，格致，黑陶，朝阳，雷平阳……必须承认，我的确遭受了一次阅读的震撼。这一批作家的存在改变了我对于散文的期待。把他们的散文收集在一起，另一种气息立即扑面而来。他们的主题、他们的遣词造句或者他们的叙事学具有与众不同的质地，这一批作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阵容。

这一批作家均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当然，谈论文学

的时候,年龄,所能解释的问题相当有限。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天平上称不出年龄的重量。郑重地提到他们的年龄企图说明的是记忆的作用。上述作家之中,许多人的散文源于记忆;刘春在自述之中说:“有些记忆是活性的,在脑子里被我玩熟了,变成文字再次投生。”在我看来,三十岁之后已经有资格使用记忆了,但是,三十岁的记忆肯定与八十岁的记忆不同。我能明显地感到,这一批作家的记忆之中奇怪地混合了勃勃的生机和略略有些颓废意味的沧桑感。

这一批作家可能给散文带来什么?

我没有在散文的领地看到诗或者小说、戏剧之中曾经发生的激烈辩论。普遍的美学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清算;另一方面,散文并没有遗留多少独特而又坚固的文体成规。相当长的时期,诗、小说、戏剧分别拥有权威的文体范本。因此,一个形式的叛徒就足够显示出令人敬佩的革命姿态。可是,散文不存在相似的冲突。对于散文说来,没有人因为攻打既定的文体成规而成为文学英雄。的确,不少人隐隐地觉得,散文的篇幅、抒情比例、情调、虚构与否以及小品、随笔、杂文、美文分别有些不成文的规范,但是,没有人太当一回事。长歌短简,议论风生,或者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站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谁说不能这么写?中国古代的散文千姿百态。一则笔记,一段随想,一篇日记,一封书信或者一份奏折都有可能成为杰作。变幻无端,法无定法;随物赋形,柔若无骨——这向来就是散文的传统。无拘无束的文体最大地接纳了未经文体规范的经验,什么鸟都可以栖身。

或许,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幸运——散文已经在一片开阔地上。散文享有更多的形式自由。可是,散文飞翔得更高了吗?不。拆掉了鸟笼之后,问题暴露得更为彻底——鸟儿飞行的范围并没有比鸟笼给定的空间大多少。触目可见的平庸无疑对于自由的辜负。现在,散文必须正视的苦恼是,自由多大程度地兑换为前所未有的文学记录。

自由肯定包含了这个涵义：自己负责。不仅承担全部的精彩，而且承担全部的平庸；没有抱怨的借口，甚至也没有权威的压抑引起的反抗能量。散文就是一个人的襟怀智慧，一个人的想像力，一个人的奇思异想，一个人走访世界的路线，一个人独自擅长的文体——散文就是这一切铸造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散文是文，散文也是人——“文如其人”形容散文再合适不过了。

自由，以及苦恼。这一批作家就是在这个时刻站到了这一片开阔地之上。

正面谈论这一批作家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窘迫。一些时常使用的范畴、术语失灵了，仿佛空转的马达。历史的韵味？先锋？后现代？时尚的能指或者文化工业？要么，回到谁都会用的“个性”？我突然明白，他们可能是还未曾被理论正式统计的一批人。这即是他们的意义。

“这一批作家”——这个团队的命名是中性的。我并没有企图强行概括他们。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拒绝随随便便的概括。我所能陈述的仅仅是稍加编辑的阅读经验。

首先提到方希、刘春、格致不仅考虑到“女性优先”的礼仪，更重要的是，她们的风格与另一些忸怩作态的女性作家如此不同。她们的笔下居然没有众多女性作家一唱三叹的恋爱生活。方希的文字从容老练，机智、俏皮、反讽甚至有些刁钻古怪。某些介于刻薄与幽默之间的句子隐含了令人生畏的锋刃，所有自恋式的搔首弄姿或者装腔作势都禁不住这种句子锋利的一击。格致叙述的世界隐藏了许多莫名的敌意。危险潜伏在所有的角落，随时可能一跃而出，攫住柔弱的猎物。格致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一个警觉的距离，惊悚和不安闪动不已。格致的叙述常常嵌入一些精彩的比喻。比喻是语言的多棱镜。我必须克制举例的欲望——我的确没有意识到，一个小小的修辞手段竟然拥有如此的魔力。一些奇特的比喻可能突然干扰叙述的稳定速度，语言的纹理疏朗了起来。当然，这一批作家均是制造比喻的高手。例如，刘春就将未名湖形容为北京大学

的子宫：“幽暗的，圆形，有水。”不同于格致的是，刘春的散文——特别是《简史》——含有一种硬朗之气，一种大大咧咧的做派。她对于柔曼的抒情肯定相当蔑视。

黑陶生活在江苏。这个江苏人的语言明亮、坚硬，没有枝蔓，也没有晃来晃去的阴影。他的写作具有工匠式的精细，大量的及物描写形成了意象的密度。显然，可以从黑陶的“照相写实主义”之中发现法国“新小说”主将罗布·葛利耶的观念。我怎么越来越多地谈到了语言？其实，我想说的是语言以何种方式把世界呈现出来。

雷平阳的叙述有一种精致的清晰，四处光线充足。可是，为什么每一篇结束的时候，我的脚跟都会渐渐地悬浮了起来？——仿佛生活突然晃动起来似的。清晰到晃动的转换如此简洁，这说明雷平阳经常发现日常意象背后的不稳定。

吕不肯定是擅长使用细节的，他的叙述多么灵巧。一切都那么到位。吕不写下的一切都与电影有关。电影、生活、生命三者是重叠在一起，它们之间的使用词汇可以互换。真的，世界在哪里——银幕之上还是陋室之中？当然，“灵巧”这个形容词对于朝阳不太合适。他甚至担忧灵巧的言辞可能遮没了粗砺的真相。太多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花边是由诗一般的辞令编织出来的。朝阳的一个重大动作就是，用朴实无华的句子把乡村从“田园风光”的美学烟幕之中拯救出来。

我的确无法概括这一批作家。我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花腔高音，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滥情和煽情，没有一本正经，没有脂粉气，也没有冬烘的迂腐或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卖弄。

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某些生活仿佛又回来了。

其实，这些生活从来就没有远离；可是，我熟视无睹。汽车，马路，楼梯，绳子，水稻，田里的青蛙，庄园，打铁铺，杂货店，炉子上的水壶，电影海报，迎亲的拖拉机，囤满种子的仓库，刀子般的寒风，一只风干的蚂蚱……这些日常景象动不动就能看到。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不是侦察一桩离奇的人命案，如果不是布置一个忧伤

的爱情故事——如果不是证明一个主题或者充当一个道具，谁管它们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习以为常的目光叙事学。我注视什么，我无视什么，一切都是目光叙事学决定的。我的世界凝定于某种不成文的格式里。

可是，这一批作家的散文证明了另外一些叙事学。他们是怎么进入世界的呢？这一批作家的文体不拘一格，可以向各个角度敞开。在他们手里，散文显示了无数的可能。他们可能找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入口，一条独到的路线，也可能突如其来地撤出。总之，他们自由自在地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事件。

什么叫作“事件”？一个“事件”的开端、结局、焦点以及重心在哪里？任何一个独特的发现都不会重复既定的叙述形式。反之亦然——任何一个独特的叙述都意味了某种发现。这一批作家的叙述把我已经习惯的世界重新整理一遍，奇异的结果出现了。一系列我所熟知的比例和方位都发生了改变：某些景象缩小了，消失了，或者旋转出背阴的一面；同时，另一些久违的景象回到了视域的中心地带，于是，一些尘封多时的生活得到了令人惊奇的再现。世界被文字改变了。

这一批作家还在默默地写作。他们不一定意识到，他们的散文同时打开了生活的成规。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文学不就是开启想象生活的各种可能吗？

目次

格

致

散文



001

朝

阳

散文



047

方

希

散文



083

吕

不

散文



131

刘

春

散文



175

雷平阳

散文



207

黑

陶

散文



255

格致，姓爱新觉罗，原名赵艳平。  
祖籍沈阳，一九六四年生于吉林乌拉。  
一九八五年毕业于吉林地区师范学校。  
现在吉林市任公务员。



## 语文光芒

——我的散文写作

### 目录

转身(5)/ 寻找消逝的文字(23)

利刃的语言(31)/ 我们的铠甲(34)

游戏(37)/ 它们的翅膀(38)

庄周的燕子(40)/ 商品(42)/ 复制钥匙(44)

我写的第一篇散文是一封情书。把散文和情书划上等号并不是我的意思,而是我的那些语文老师的共同看法。并在二十年前就已盖棺定论。要想理清散文和情书的复杂关系,就无法避免回忆过去。过去是我不愿回忆的,尤其还涉及到我的个人隐私。但是我发觉,我的那个过去已十分遥远,远到不像是我的过去,而像是与我毫不相干的别人的过去。而讲述别人的过去在我是容易的。

我的散文写作从十九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二十年前,似乎永远开着丁香花。那些写在学生用笔记本上的语句,负有重大使命——它们记叙和阐明了我认为生命中最重要事情——当然这一使命也完全可以用口语去完成。但我一直认为文字较口语更庄严更有力量,更适合肩负重大使命。比如两国交战或交友,就很少有捎口信的。口语似那些弯弯曲曲的,似有似无,被蒿草淹没的小路。而书面语则是宽广而笔直的大道。我永远迷恋文字的沉着和大气。

最先迈上这条大道的是我的第一封情书。它带着丁香花枯涩的味道踏上了旅途。那个只有几克重的信件几乎承载着我的十九岁的生命。道路是平坦而笔直的,但我的穿着华丽、缀满珠宝的情书,却在中途遇到了强盗。它被强行送进了校长室,而没能抵达被我看上的一位语文老师的书桌。在那里,自由恋爱还是早春的弱草,而师生恋则是罌粟花,一定得铲除。在就要把我拿去开除之际,一位副校长认真阅读了我那惹祸的情书后,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说,谁说这是一封情书?哪一个字、哪一个词能够证明这是一封情书?这是一篇习作,一篇略有些跑了题的习作!这样,我的第一封情书被学中国文学出身的副校长定性为跑了题的习作。开除我的议案随之搁浅。

而习作,尽管跑了题,离现在意义上的散文的距离已经很近了。看来,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就能把情书写得像作文,也就是像散文。我的写作才华在写第一封情书的时候就如接触不大好的灯泡,忽地闪亮了一下,虽然这刺目的一闪带给我的是漫长的黑暗。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似乎忘记了过去,又拿起笔来写字的时

候,我发现我写的仍然是一封情书,仍然是那种我擅长的略有些跑题的习作!而这习作仍然是寄给语文老师。(不是原来的语文老师了,我不太痴情,我已有了新的语文老师——我进修的学院的中文系教授。)这一封情书的命运比上一封略好一些,它总算安全地走过了那条在我看来笔直而平坦的大道,顺利地抵达我的满头白发的语文老师的书桌。那语文老师似乎对我提出的给他老人家当媳妇的建议不大感兴趣,而单单对我的那封情书产生了激情。我觉得他这是绕过了小姐而看上了丫头。他用语文老师的目光评注了一番我的“习作”,并在他认为极精彩的句子的下边加了水波线。最后他总结说:黑色幽默!然后又一字一顿地说:你一定能成!我看见他在说这五个字时咬牙切齿目露凶光。但他的手却极慈祥地抚过我的只有二十四岁的头发。

不难看出,我的两次写作实践活动,都是从写情书开始,从两个闪耀着语文光芒的男人开始。(被我看上的男人都是语文老师,如果去掉语文,我决不会喜欢他们。那么,我爱的是语文?这似乎也不对,我从未产生过嫁给一部《史记》的念头。只有闪耀着语文光芒的男人才能进入我的视线。我的视力不好,发出强光的人,才能被我看到。我看到了那迷人的语文光芒,并冲着那光亮走过去。)并以一个饱满的一厢情愿的爱情作为营养基。应该说,我的文学写作的起点是非常高的,它是从一个情书的高度上迈开脚步的。而在这个基础上的写作,不会缺乏基本的营养。

如今,那些情书都成了我的土壤,而我的可爱的语文老师(但愿他们还活着),统统被我埋在这土壤之下,愿他们早日分解成有机肥料,给我以营养,给我的写作以最有力的推动。

## 转身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

这段文字写于两年前,是我的一篇小说的开始部分。它涉及到十五年前,我短暂的乡下教书生涯。比如“平房”这个词,就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当然,那段日子留在我记忆里的最顽固的东西,还是半夜响在我宿舍玻璃上的敲击声。那种声音如一块不规则又坚硬的物质落入一杯清水中,轮廓清晰地卧在杯底,一直没有被时间融化掉。两年前的文字没能公开发表,那个关于楼梯的恐怖故事只被我一个人读到了。之后,它便如泥沙一样沉到了我书桌的最底层。

我并不特别怜惜它,像一盘做得不太对劲的菜,没有吃,却也没舍得倒掉,它被放在冰箱里,不知该如何处理。我想等着它自己发霉,然后理由充足地倒进垃圾袋。但这两天,我忽然想起了那篇东西。至于为什么,我想和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楼梯、恐惧、黑色——有关。于是,在一个光线烂漫的午后,我从一大堆手稿中艰难地找到了那篇小说并重读了它。

那段日子住在乡下,宿舍以及工作单位都是平房,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楼梯,也就没有出现恐惧。恐惧是从楼梯的积尘中衍生出的怪物。它从灰尘与阴暗潮湿中获得了生命后就迅速长大,然后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慢慢爬了上来。从楼梯上爬起来的恐惧是一个高大的黑影,它立在我的面前,张开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那是晚上九点以后,微弱的月光将人涂成黑色,而其他物体都反射着月

亮的白光。人是吸光的,只有强光才能把人照亮。被涂成黑色的无疑是个男人。我同这个黑色的男人在楼梯上相持了近三十分钟……

从这段不足三百字的叙述里,“楼梯”一词出现了五次,“黑色”出现了三次,“恐惧”出现了三次。“楼梯”在这里被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承载一个恐怖故事。它同“黑影”、“黑色”、“恐惧”等可怕的词语一同被我投到一口冒着气泡的锅里,然后我在锅下加了燃料,并利用风力使它们猛烈地燃烧,然后我用力搅拌,使锅里的物质黏稠得像一锅米粥。我看到“楼梯”这个原本什么味道也没有的词语经过这一悉心煮熬粘满了浓稠的恐怖的汤汁,使我再也无法辨认出它原来的,也就是三十年前它刚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纯洁模样。我在一篇题为《楼梯》的散文中对楼梯做过这样的描述:大约是我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城里的姑姑家串门。我被大人牵着一只手,走着那完全陌生的水泥楼梯。我记得那楼梯间是黑暗的,在大白天也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而我却能感觉到脚下的起伏,我多想看清它们的样子。在那样的黑暗里,我并不完全明白,我正在被楼梯一阶一阶地推离地面,它们毫不费力地就抵御住了地心对我的缚力。

当我走到姑姑家的窗前向外望时,我看见了柳树的梢头,也就是一棵高大的柳树正被我俯视着。而在八年的生活经验中,从未从这个角度看到过一棵柳树,我总是在它的树阴下,围着它粗壮的树干玩耍。我在一瞬的惊异之后,马上明白了是那些黑暗中的楼梯将我举托到一棵柳树之上。我又看见了道路、行人以及行进中的汽车,它们在我的俯视下,都奇迹般地缩小了,变得不可怕了。而在此前,我是多么害怕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它在一个八岁的幼童的眼里,是一头怪兽。也许那时,我就隐隐地感到了恐惧和距离的奇妙关系。又八年后,我将自己从乡下连根拔起,移植到城市的楼梯上。我的根须带着乡下潮湿而富含营养的泥土,在城市的楼梯上艰难

地成活。我的柔软的,习惯于同样柔软的泥土的根须,是如何在冰冷坚硬的水泥上扎下根,只有我自己知道。水泥上长不出任何一朵花,我从来没能使自己的根须伸进水泥哪怕一厘米。实际上,我被迫变成了一株攀缘植物,被迫长出无数吸盘,我凭靠着它们的力量牢牢地贴在城市水泥的表面。春天绿,秋天红,我装饰着一堵灰色的水泥墙。我的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是不是为了最后的与楼梯生活在一起?那一年我十六岁,楼梯在我的脚下就像冲浪的人脚下的海浪,它们给了我俯视的高度、梦想和激情。显而易见,楼梯的出现,给我带来了激情和希望,它几乎是以一个天使的完美形象出现在我二十年前的生活里。乡下的生活,我的双脚可以向前走,向后走,还可以向左走向右走。而城市的生活,也就是有了楼梯的生活,使我能够向上走,竟然还能向下走。这种走路方位的改变和拓展,无疑会震荡我的思维,并在某一时刻使之突然发生转向。

仅仅是几年的时光,楼梯已不再通向欢乐和希望,而是埋伏着恐惧和杀机。

当我洗好那些衣服,准备往回走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了。洗好的,潮湿的衣服被我包好抱在怀里。那是很大的一包。因为宿舍没有洗衣机,我把被罩、床单什么的一起拿到同学家去洗。楼梯间很暗,墙上方形的窗子透进一块月亮和街灯混合后的光线。那包衣服仍抱在胸前,它挡住了一部分视线致使我的步伐偶有磕绊,一直无法流畅。即使如此,要不了五分钟,我也能走完通向我宿舍大门的所有台阶。然而,阻碍是突然出现的,像草丛中突然昂起的蛇头。他迫使我停了下来,而且停留了三十分钟之久。

三十分钟,如果是坐在藤椅上喝茶,沐浴着午后温暖的日光,听着身后绿色藤萝的攀爬声,它的长度相当于从茶杯中升起的一团水汽,然后在空中翻卷着消散;如果是手负重物站在夜半黑糊糊的楼梯上,它的长度就如用冷水去溶化一块冰。对于即将发生的三十分钟事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平常的一天,

而且接近尾声。回到七楼宿舍后,一个冗长的睡眠将使我跨过明天的界碑,且不会留下足迹。

其实,事情的开端当追溯到二楼,那不是个该引起注意的事,仅仅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个男人。那人步伐极快,只几秒钟就从我的身边、甚至是视线之内消失了。接着听到他在我的头顶发出鞋与楼梯的摩擦声。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还向一侧靠了靠。我们谁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一步两台阶,走得极为轻盈。

事情的变化也是突然的,像魔术师手中的木棒瞬间就变成了蛇。当我走到三楼转弯处时,那个已从我的视线之内消失的人,又从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他又从上边下来了——和我形成了相向的局面。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怀疑)。没听到他敲哪个门,开哪个门。以他的速度是刚到四楼马上就下来了,不在任何一扇门前停留一秒钟。他极像是走错了单元,而且这个错误是走到四楼才发觉的。当他又一次与我擦身而过时,我忍不住开了口:你找谁?

这句多余的话证明我当时心情挺好。心绪不佳时,谁去理会一个陌生人遇到了什么困难。这是单位宿舍,大部分住户我都认识。我很可能帮得上他。因此,我的语气非常友好。

就找你。这话是他说的。语气顽皮还带着一丝凶狠。而这丝凶狠是在他转到我的身后敏捷地抱住我的腰又捂住我的嘴之后才分辨出来的。

我木然站着,挺了有十秒,并未听见他爆出大笑。这不是一个玩笑。我被一个陌生男人劫持了。时间是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地点是我宿舍楼三楼转弯处。目的尚不清楚,但抢劫、杀人、强奸,再没别的了。

我陷入了困境。这和六十年前,我母亲遇到的麻烦极其类似。而我母亲最终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在今天看来我母亲的经历更像一段传奇: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母亲十六七岁。日本人还没有完

全撤离,但苏联红军已经来了。母亲的家住在古城乌拉街,但在乡下有些田产。显然母亲的家是个地主。地主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被唤做三姐的母亲在春天的时候想到乡下的老家玩几天,也许只为取一副鞋样。就在她去乡下的路上,迎面遇上了一位苏联骑兵。这个高大的同东北农民迥异的苏联骑兵并没有骑在马上,而是牵着马在走。他走得很慢很悠闲。他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异国土地上的景色。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春天同顿河以及伏尔加河的春天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当时的母亲已从乌拉国民优级学堂毕业,但她不知道苏联红军远征的意义。她读的书上没有对苏联红军提过一个字。她先读私塾后又读日本人的小学,读过四书五经和《红楼梦》,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接触了数学。会唱日本歌,说日本话。日本人杀中国的大人,却耐心细致地教中国的小孩唱不知其意的日本国歌,也是用心良苦。那时的母亲不甚明了,日本人和苏联人到自己的家乡来主要是干什么?十六岁的母亲心里没有国际形势,那时母亲接触不到广播和报纸。但母亲心里应该有刚刚萌生的爱情。爱情是不需要广播和报纸的,甚至不需要文明,它与生命同在。

十六七岁的我的母亲走在一九四几年北方春天的乡村路上。柳树一定是绿了,还有江水,流得很急,若说野花的话,应该只有蒲公英开放了。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细碎的蒲公英的黄花在母亲绣着牡丹花的鞋边摇曳。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苏联红军,手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的骑兵和他的马将母亲的去路拦住。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看了一会儿,母亲是那种细眉细目苗条又丰满的女子。苏联红军对于这种同他们民族的高鼻大眼的姑娘截然相反的女子产生了兴趣。据我母亲讲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伸出了手,一下将母亲的外衣拽开。衣扣噼噼啪啪地迸落,灾难已成定局。就在这时,应该叫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命运中的保护神,飞抵母亲上空。于是出现了奇迹:那匹一直沉默的,冷眼旁观的战马,突然一声长嘶,然后忽地飞奔起来,并将那骑兵一起拖走。原来,马的缰绳不是牵在手上而是绑在了手上。

母亲僵僵地站在那里,被撕开的外衣里是一件火红的毛衣。那毛衣像火焰一样在春天上午的光线里闪着夺目的光芒。那战马就是被这突然出现的红色火焰吓惊的。

这个故事由母亲讲述,我相信它是真的。我还相信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它不是已经发生,就是将在以后发生。虚构并不存在。虚构是暂时的。人世间装得下所有故事。

六十年后,我遇到了同母亲一样的事情。

牢牢地抱住我的男人手里没有牵着马,也许有一把短刀藏在衣袋里。我手里抱着的衣服砰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溅起的灰尘像水波一样荡开又如花朵一样开放。

这是一声闷响,地面给予包裹的反弹力如一片细嫩的禾苗被重重地压在一块石头下面,发不出一丝声音。这个沉闷的声音对于我的精神是一记重击。它像一声雷,接下来的是大雨。而对于他则刚好相反,它是明明白白的催促,奔马耳边的鞭响。

那个包是我的,它一直被抱在胸前。里边包着我的毛衣和裙子。它们被洗了又洗,纵横的纤维里充满了洗涤剂的香味。它们是不能挨近灰尘和泥土的。灰尘是它们的敌人。我的使命就是用身体的高度将它们托离地面,远离尘土。它们是那样潮湿,易于被尘土污染,像婴儿易于被病菌感染。

此刻,它掉到了地上,在它们湿漉漉的时候,掉到了可怕的尘土里。我觉得是自己砰的一声滚了下去,顷刻间被尘土包裹。我身上的水珠召唤着尘土,它们是天然亲和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将自己从泥土中重拾起来。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人的胸前,等待着奇迹发生。过了有十秒钟,我失去了信心,我命里没有守护神。

我的脸的二分之一被他的手捂住。还好,鼻子被留在了外边。就他手掌的宽度来看,完全可以连鼻子一同捂住。他是有意留的,这说明他不想置我于死地,还说明他是个有经验的家伙,做起攻击